

非洲各国的境内移民与越境移民之间的关系：非洲局势

阿德兰蒂·阿迪波如*

引言

近年来人口自愿在境内或向境外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存在着不断增大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不论其原因还是其后果，均与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和人口上的诸方面有关（海泽尔，1982年）。就其本质而言，人口迁移至少涉及三方：移居者、来源地或来源国、目的地或目标国。境内移民原则上是指在有明确地理界限的境内的人员迁移，不受法律规章的限制；越境移民则必然面临一系列、有时是复杂的规定，首先涉及从来源国出境的问题，然后是接纳国的入境、居留以及最后从接纳国出境的问题。

在非洲就像在一切发展中地区一样，为了了解一般的移民问题、了解境内移民与越境移民的区别与关系、其原因以及管理政策等方面，必须了解其历史演变及政治发展的各个阶段。就非洲的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年的国界划分所带来的后果，60年代初以来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尤其是各国移民管理规定的制定。不久以前，人们在非洲广袤范围内自由迁移，本来无所谓境内移民与越境移民之分，而这些管理规定却带来了微妙的区分；而且，越境移民之中还有正常的合法移民和隐蔽的非法移民之别。根据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以及各国政府对此采取

的对策，下文将对这些关系进行分析。

非洲的人口流动： 历史的简要回顾

从非洲各国的政治与历史演变入手，可以更好地了解非洲的人口流动现象。如就前殖民时代、殖民时代及后殖民时代的框架进行考察，殖民化与非殖民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人口流动的间接影响是非常清楚的。在殖民时代以前，非洲的人口迁移大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生态的情况有关，尤其是互相残杀的战事、自然灾害以及对可耕地或新聚居地的寻求。其结果是这种流动的非系统性，成群结队的人从一地迁往另一地，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是不分类的（阿迪波如，1979年）。

殖民政权曾经为和平及政治稳定铺平道路。以前那种因互相残杀的战争引起的人口流动或停止或有所减少；但此后人口流动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如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冲突中，在乍得、安哥拉、乌干达、尼日利亚的内战中，以及在非洲西部、中部和南部的解放战争中，人口迁移以难民的形式出现。自然灾害仍在肆虐，西非萨赫勒地区及东非某些地方的干旱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包括妇孺）流离失所。人们还在寻觅新的或肥沃的土地，而且无地的贫民为数大增，尤以东部非洲为甚。

主要是为了满足矿山及种植园对劳动力的越来越大的需求，殖民时代采取了各种强迫手段和刺激措施。在西部非洲，例如上沃尔特和马里，法国殖民当局采取各种方式强制征募劳工。东部和南部非洲则以一套严厉的经济措施取代强迫手段，召引矿山及种植园所需的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力。

应该特别提到南非的情况。从1963年起，禁止劳工带家属住在工作地点，再加上工资微薄和劳动条件不佳，首先导致劳动力的迅速轮换。南非当局之所以制造这种情况是为了把工资压低到仅够糊口的水平。劳动过于艰苦，以不足两年的合同雇佣的劳工，其劳动生产率势必迅速降低；当受到重税盘剥而精疲力竭的劳工被新的替换后，生产率又得以保持甚至提高。

在非洲的境况下，包括越境移民在内的这种临时移民模式的根源在于：因工资微薄和福利设施不足而大失所望的劳工在家乡与矿山之间流徙。在某些情况下，劳工们宁愿永远返乡也不愿留在劳动条件实际上很不人道的矿山和种植园。按照这种看法，以目标地的需要来解释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移民的临时性质就不合适了。一些根本性因素可以追溯到工作的组织、一般而论不能带来像样生活的那种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因此，就像人们在赞比亚、喀麦隆（在前西属几内亚的种植园中）和尼日利亚所能见到的那样，随着劳动条件的改善，移民工人开始稳定和“恋栈”，甚至还吸引其他劳工前来。到了独立时代，人口迁移变得制度化。但在西部和东部非洲，有关家庭团聚、居留及合同工制度的各种限制性措施这时都已取消；惟独南非的情况相反，种种限制不但继续，甚至更为严厉。

当前非洲各国的发展战略都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无例外地影

响到为当地居民提供机会的结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旨在支持国家发展战略的关于投资的跨国公司的诸项政策，对于各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就业机会的定点和类型以及收入与生活条件方面，后者转而又影响到非洲的国内和国际人口迁移。

各类人口迁移：原因与相互关系

关于境内移民和越境移民的文献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到，人们一般认为，经济上的考虑是决定人口迁移的首要因素，人们的迁移毕竟还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人口迁移就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刺激的反应（虽然有时失之夸大），其中大多是由于各经济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各国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引起的。

关于各国之间或某一国家内部的这些不平衡现象，通过哪些因素可以得到解释（阿迪波如，1977年）？这个问题使得人们不仅思考关于现有的各种机会的信息网络所能起的传动带作用，而且研究尽管订立了管理境内和越境移民的规章制度，人口迁移何以仍旧不难克服各种障碍而实现？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境内移民与越境移民之间的微妙区别。在正常情况下，国际移民理应符合关于在他国入境和居留的一系列要求。但具有明确有效的移民入境法的非洲国家只有不多几个。尤其突出的是，除了南非这个明显的例外，严格实施这种法律的国家更为少见；而且，不管怎样，或出于故意或出于无知，迁移者均对此视若无睹（孔代，1979年；阿迪波如，1983年）。

境内移民大多是由于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引起的，而迁移方向大

多取决于能提供就业机会的计划项目的所在地。因此，既然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公私投资大体上都集中于该国的主要城市（往往就是首都），移民的主流当然就会以此为目标。不过，位于农村地区的种植园、矿山及其他企业只要容易就业且有其他机会，农村内部也会出现可观的移民潮流，如喀麦隆、肯尼亚等国就是这样。

同样，越境移民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国之间在发展、就业机会，尤其是收入和生活条件上的不平衡而引发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缺乏严格的入境限制，加之以关于不同地点现有多少机会的信息传播得既迅速又有效，人们认为，移民潮会对这些积极的（往往渲染夸大的）信号做出即刻的反应。然而，不论对移民流出国还是流入国来说，越境移民或许比境内移民会在政治上、社会经济上和人口统计上造成更大的后果。因此，现已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用以甄别、必要时还要限制流向目标国的移民潮。

所以，不论境内移民还是越境移民（如果是自发性的），显然一般均出自同样的系列基本原因，而对越境移民施加的限制更为严格，或者更容易实施。由此也可以解释何以根据扎查利亚和孔代（1981年）的统计，西非境内移民的数量为越境移民的一倍。在西非的情况下，境内移民与越境移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两者的因素意味着：

境内移民一般是越境移民的延伸。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从内地流向沿海地区。一方面，在出国移民与境内移民之间存在总体的负向关系；另一方面，在外来入境移民与境内移民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在上沃尔特及多哥，境内移民率低，而出国定居的移民率高。反之，在加纳、

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境内移民率高，而国民的出国移民率相对较低……[所以]，境内移民率高的地区其外来入境的移民率也高。

从理论上说，国际移民与境内移民是互补关系，甚至可能互相加强。首先，如上文所述，这两者均出自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与经济因素，但主要与迁居者要求改善其生活福利有关。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因自然灾害（干旱、饥荒）而流离失所者，或因逃避战争或政治迫害而流亡的难民，但所谓的“经济难民”不在此例。再者，从政策的角度来说，不论对于境内移民还是越境移民来说，发展通常具有首先在短期内刺激人口迁移的作用。反之，从长期来说，对于劳动力的出口国，国家的持续发展乃是限制或防止大批潜在的出境移民流往富国、或吸引他们返回祖国的可行的政策手段。这项战略的根据就是认为：如果人民在其本地或本国的现有机会结构中不能满足其希望和要求，他们就要大量迁移。所以，决策者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发展怎样能使国际移民在本土就可满足其要求和需要？如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那样高度依赖向南非矿山出口劳动力的国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尤其带有决定性。西非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沃尔特，它也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力出口国（详见下文）。

造成越境移民的因素不完全是经济上的。斯皮尔（1974年）指出，在国际移民问题上，政治因素往往比经济因素更重要。殖民当局武断地划分的边界将经济上与种族上有共同性的人口割裂开来。某些国家要求调整边界以便适应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将那些被武断的划分不同国家的部族人口组合起来，因而导致武装冲突（阿迪波如，1982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索马里和

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其次还有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造成大量难民流离失所。

移民的类型

从时间角度考察移民问题，便涉及迁移的距离和在目的地居留的期限。按照本文作者主要就境内移民制订的类型表（表1），可以根据移民的方向、型式、迁移距离和居留期限加以分类。如果进行一些修改，本类型表亦可用于国际移民。例如，“方向”对境内和国际移民都适用，时间问题也是这样。然而，“距离”项却随所在国家幅员的大小而不同。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1982年）的出版物略述如下：

与其他发展中的区域相比，非洲国家的幅员相对较小，因此，在别处可能属于境内迁徙的移民型式，在非洲却是越境移民。

例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与迈杜古里之间的迁移，全程约1700公里，根据距离（空间）标准属于境内移民，而从尼日利亚的伊迪洛科至贝宁共和国的艾弗因的距离约10公里，却成了国际移民。这一情况也适用于例如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加纳和多哥、或尼日利亚和贝宁之间的边境工人，他们的家住在国境线一侧，每天越境往返于农场。如库姆普尔和卢基（1974年）所指出（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在多数情况下，多哥人的家乡和他们在加纳的住所之间距离不太远，很多情况下甚至比那些住在阿克拉而来自阿散蒂、布隆—阿哈弗和北方诸区的加纳人离家乡更近。因此，在加纳的大多数多哥人一

方面经常回家乡，另一方面又在加纳保持半永久性的居留。

萨赫勒诸国（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尔和乍得）非常贫困，居民大多为游牧者、半游牧者和定居农民（马哈姆，1979年）。在游牧部落中，以住在尼日尔、马里、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富拉尼人（亦称普尔人）为数最多。有些游牧部落的家乡已被国境线分割，如提达人就被分割为分属利比亚和乍得两国。事实是，殖民列强任意强加的边境线有时的确严重妨碍了游牧部落的自由迁移。在寻找水源的季节里，他们往往跨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国界。此外，除索马里之外还有一些索马里族的游牧部落分布于吉布提、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我曾提出如下看法：

在获得政治独立和明确划定边界以前，特别是在西非，超越国境的人口迁移频繁发生。边界的划定作用不大，许多移民无视“人为的”边界线而自由迁移（阿迪波如，1979年）。

这就是说，在非洲大陆有许多迁移人口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移民（阿普尔亚德，1981年）。

在西非，一些边境上的季节性和临时性的移民劳工总是把他们的迁移看做只是一种“境内迁移和乡间流动的超出国境的延伸”。的确，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证实一个旅行者是否跨越国界。人们或所谓的部族的混合是非常有趣的：那些讲门迪语的人分别住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瓦依人和克鲁人也是这样。约鲁巴人分布在尼日利亚和贝宁，而埃维人在多哥和加纳。事

表 1. 非洲移民类型表(试用稿)(以国境内部移民为主)

方向	型式	原住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行距离			时间方面(在目的地的居留期限)			
		短程	中程	远程	短期 (季节性)	中期	长期	永久性
从农村至其他农村	开辟新地 迁返原地	相当于最小行政区 范围的迁移	相当于区域内、国内或省内的迁移	超出区域、国家或省的迁移	不到两年的居留	2—10年的居留	10年以上的居留	20年以上的居留
从农村至城市	直接到位	移	些地方范					
从城市至城市	直接到位							
从城市至农村	开辟新地 迁返原地							

情于是如阿普尔亚德 (1981 年) 指出的那样, 在劳工移民的某些型式之间或许只有非常微妙的差别(尤其是在非洲大陆), 因此, 企图制订更严格的规定固然是用意可嘉, 而能否办得到却不容乐观。不过, 他还是认为很有必要制订新的类型表和分类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在非洲链式反应所引起的移民和集体移民可能是境内的, 也可能是国际的。与主要由于经济因素的“自愿的”移民不同, 在非洲这种大批的移民不论是境内的还是越境的, 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而是与政治和宗教因素有关, 有时是由于自然灾害。

且不谈作为特例的难民(战争或内乱的受害者)、流放者(非常状态下的移民)或朝圣进香者, 还有一些事例是集体的境内和越境迁移。境内迁移的例子如尼日利亚南部佃农的迁移。由于移民安置计划的结果, 在加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赞比亚, 都有过自发的集体迁移。我曾经指出:(阿迪波如, 1983 年)。

同质社会之间的集体移民不限于境内迁移, 越境迁移也很重要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尼日利亚人流向加纳、多哥和

贝宁。一些约鲁巴人集群地从尼日利亚某些相同的地点出发, 迁往特定的目的地。他们从同一村庄或城镇出发, 往往成群地或“链式”地迁往目的地。

在缺乏官方援助的情况下, 这些非洲移民依靠由朋友、亲属和同乡组成的社会关系网, 得到启程的信息、抵达后的住所及就业帮助。

关于在法国居留的马里、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非法移民的情况, 孔代 (1983 年) 曾以此作为这一特征的明显例证:

有迹象表明宗族纽带依旧充分发挥作用: 兄弟、伯舅和中表亲戚接纳他们的兄弟、甥侄和中表亲戚, 如此等等……分属不同社区的人分住不同的旅舍……每个社区都在重新聚集。黑人社区、尤其是 Soninkes 人和 Toucouleurs 人(塞内加尔东部的混血黑人), 这方面的特点尤其突出: 按老家村庄重新组合, 每个移民保持着在故乡的身份。尚未找到工作或失业的人可以指望由社区基金提供救济。

从以上以及其他类似资料可以看出, 非洲的移民, 不管是境内的还是越境

的，仍然保持着其故乡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原型，他们认为目前的（临时）住地不过是故乡社区的延伸。扎查利亚和孔代（1981年）曾提出，非洲人认为越境移民只是境内移民的延伸；按照孔代的看法，推而广之，这一说法可以适用于超越非洲范围之外的越境移民。

政策：以境内移民取代越境移民

鉴于移民（大多是未受过教育、中年的非熟练工人）以及农村经济的特点，非洲农村间的移民不失为解决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一个替代办法。特别是在喀麦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地区内对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当地资源的差异性以及农业计划项目的选点定位等，都可以作为农业部门吸引移民的强大因素。西非的情况同此，多数移民是从一个农村流往另一农村。肯尼亚也不例外，利文斯通（1981年）指出，那里的主要移民潮其实是流动于农村与农村之间。据1970年的人口统计，加纳60%的境内移民也是在农村之间迁移。

正如这种农村间的迁移对很大一部分非洲移民来说是流往城市的一种可行替代选择，越境移民很大一部分也是迁往目的国的农村。边境地区的外籍劳工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定期越过边境到邻国的农村地区打工。例如，在赞比亚，1963年时60%的非洲移民住在农村地区。迁往城市者占32%，主要是熟练工人（奥哈代克和特斯法吉奥吉斯，1974年）。1960年加纳有2/3（67%）的外国人住在农村地区，1970年这个数字略有下降，为65%（扎查利亚和孔代，1981年）。

难民的分布情况也是这样。非洲难民大部分来自农村，而且大多居留于收容国的农村。有的住在有组织的农村安置地，如在苏丹、坦桑尼亚和索马里那样。有的

则与当地居民杂居，在索马里就有这种情况。其实，据估计约有60%的非洲难民没有住进安置地和难民营，而是杂居于当地人民之中（阿迪波如，1982年；请一并参阅所引用资料）。

然而，这个结论并非毫无例外。苏丹被视为城市难民最多的非洲国家，估计有50%的难民住在城市里。在非洲，特别是在苏丹、吉布提和坦桑尼亚。外来难民就像境内移民一样，与城市或乡村原来的居民杂居共处，同他们一起为谋得工作岗位及其他机会而竞争。还有资料显示，1974年在利比里亚10岁以上的居民中有5%是入境移民，其中64%住在城市。

总之，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包括难民在内的非洲移民都在为有限的工作岗位而激烈竞争，其中有些人填补了业已迁往国外的国民所空出的岗位。此外，一些国民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获得各种机会而迁居国外之后，来自农村的境内移民也竞相谋取他们原来在城市据有的工作岗位。以喀麦隆为例，过去那种在农村之间流动的移民近年来已经转变为从农村流向城市，其原因主要是种植园地区工资微薄。迁往城市的农业工人后来在城市有时在农村从事商贸等行业，他们原有的位置则被尼日利亚的入境移民所取代（阿迪波如，1983年）。孔代（1979年）举出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出现的这个类型的生动实例，那里的农村移民接替那些以前流往法国城市的外出移民留下的工作；而在西非如上沃尔特和马里，农村移民则接替迁往加蓬的移民留下的位置。

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范围，而且间接地影响到境内移民或越境移民的迁移速度与方向。到了经济复苏阶段，就业机会明显增多，这个国家就能够重新吸引那些迁往其他国家的移民，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就是

明证。同样道理，经济情况恶化能把劳动力进口国变成劳动力出口国。例如，直到1970年，加纳还是西非的主要移民进口国。加纳的可可种植园和金刚石矿吸引了来自多哥、尼日利亚、上沃尔特和马里的移民。此外，加纳国内还有许多在地区间迁移的境内移民（扎查利亚和孔代，1981年）。然而，经济与政治情况的恶化，却迫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年人，包括境内移民在内，流往国外，特别是尼日利亚和非洲以外。如今，加纳成了一个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动力流往国外的国家，这种局面在今后十年内难以扭转。

例如，赞比亚过去曾花费许多钱吸引欧洲和非洲的熟练工人以便经营该国的工业和开采铜矿。1960年前后，入境移民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1960—1964年间，竟然达到就业人口的24%（奥哈代克和特斯法吉奥吉斯，1974年）。1966年，这一比例降至19.9%。自从1964年独立以来，赞比亚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推动就业人口“本地化”。如奥哈代克和特斯法吉奥吉斯（1974年）所说：

赞比亚以及作为其入境移民之来源的各邻国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对于各国之间的移民往来已经就经济和法律两个方面采取限制措施。赞比亚规定签证及工作许可证的发放制度，而那些移民来源国在政治独立后所开发的经济机会则构成取代向赞比亚移民的备择方案，从而减少这种外出移民。

也就是说，作为移民来源的各邻国实现独立之后，其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遏制或减少移民流向赞比亚。同时，自己国家有了另外的就业机会及相关出路，也会鼓励移民返国，赞比亚人于是有机会接替他们的工作。

这种变化除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的一

面。各国政府建立签证和护照制度，实行本国币制和各种形式的入境限制，从而减少了自由越境的现象。此外，近来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进一步减少了劳工越境迁移，特别是在东非和南非。例如，尤其是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按照其反种族隔离的政策，已禁止国民出境到南非的矿山当劳工。

独立以前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是南非外籍劳工的主要来源。独立后不久，莫桑比克就开始限制国民前往南非。同样，津巴布韦也有效地阻止了设在国内的募工办事处向南非矿山提供移民劳工，进而统统关闭了它们。早些时候，在1974年，由于弗朗西斯敦空难导致82名应募劳工丧生，马拉维政府已禁止为南非招募劳工，但是准许已到南非的移民劳工完成原订的合同（埃尔肯，1978年）。

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高度依赖向南非的矿山出口劳工，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日益担心这种依赖会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当南非主要由于当地失业增加，逐渐减少对外籍劳工的需求的时候。近来，所谓内部化政策、继续依赖外籍劳工的危险以及某些立法改革，已使南非提高对本地劳工的需求。与此同时失业在增加，尤其是工业部门，迫使黑人居民“不得已”充当金矿工人——一种人们最不愿干的工作（斯塔尔，1982年），从而填补由于来自传统的劳工供应国的外籍劳工减少而造成的空缺。这种情况对于南部非洲的一些主要的劳工输出国，如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为减少其国民向外迁移，大力推行促进提供就业机会的战略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上沃尔特和马里，在所有这些国家内，指向就业的发展战略可能为国际移民问题提供某些就地解决的方案。

[冯炳昆译]

注 释

* 本文原刊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1984年第3期(中文版1985年第3期)。作者阿德兰蒂·阿迪波如当时任尼日利亚的伊费大学教授。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DEPOJU, A., 1979. 'Mig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XXXI* (2).
- 1982. 'The dimension of the refugee problem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81 (322).
- 1983.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In P. A. Morrison (ed.), *Population Movements: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in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iège: IUSSP. (Ordina Editions.)
- APPLEYARD, R. T., 1981.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 on problems of assessing causes and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pon the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A New Approach to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e Population Fie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o. 4. Paris: CICRED.
- CONDÉ, J., 1979.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Some Considerations*. Paris, OECD. Mimeo.
- 1983. 'Study of illegal Immigrants through a socioeconomic survey of Malian, Mauritanians and Senegalese migrants resident in France'. Information Paper, ICM Sixth Seminar o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 UNDOCUMENTED MIGRANTS OR MIGRANT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Geneva.
- EGERO, B., 1979. *Colonization and Migration: A Summary of Border-Crossing Movements in Tanzania before 1967*. Research Report, No. 52,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ppsala.
- ELKAN, W., 1978. 'Labour migration from Botswana, Lesotho and Swaziland'. In W. M. J. Van Binsbergen, and H. A. Meilink (eds), *Mig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Africa Society*. African Perspectives No. 1, Leiden.
- KUMEPOR, T., LOOKY, S. I., 1974. 'External migration in Togo'. In S. Amin (ed.), *Modern Migrations in Wester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 HEISEL, D. F., 1982.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rab World*. Proceedings of an ECWA Population Conference in Nicosia. Beirut: UNECWA.
- LIVINGSTONE, I., 1981. *Rural Development, Employment and Incomes in Kenya*. Addis Ababa: ILO/JASPA.
- MARNHAM, P., 1979. *Nomads of the Sahel*. Report No. 33 (rev. edn).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 OHADIKE, P., TESFAGHIORGHIS, H., 1974. *The Population of Zambia*, Paris: CICRED.
- PRYOR, R. J., 1978.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 some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In *Solicited Papers: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ssues for the 1980s* (Helsinki 1978). Liège: IUSSP.
- SPEARE, A., Jr., 1974.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of internal migr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G. Tapinos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o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relation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ris: CICRED.
- STAHL, C. W. 1982. 'Recent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African labour in South Africa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F. de Vletter (ed.), *Labour 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frica*. Rome: FAO.
- UNITED NATIONS, 198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A World Surve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ZACHARIAH, K. C., CONDÉ, J., 1981.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Demographic Aspe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